

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

——文献述评及思考

刘俊杰, 张露

(广西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 本文梳理已有研究文献, 将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归纳为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已全面进入“刘易斯转折点”阶段; 而第二种观点持相反意见, 认为“民工荒”是特殊背景下的结构性失衡现象, 我国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态势不会轻易发生逆转;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我国经济处于“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内。从不同视角认识这些争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刘易斯转折点”, 应对日益严峻的“民工荒”现象, 更好地利用和兑现人口红利以及做好迎接“刘易斯转折点”的准备, 实现我国经济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协调转型。

关键词: 刘易斯转折点; 民工荒; 人口红利; 经济转型

中图分类号: F24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1) 04-0045-06

Has China's Economy Entere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 Further Thinking

LIU Jun-jie, ZHANG Lu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6, China)

Abstract: Has China's economy come into the stage of "Lewis Turning Point"? In the academic circle, the problem is widely discussed in the judgment standard, actual effec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paper reviews the existing research literature scholar's point of view, the existing research w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view points: the first kind of view is our country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Lewis Turning Point" completely. But the opposite opinion believes that "Labor Shortage" is the phenomenon of structural unbalance occurring in special background. The rural labor supply situation will not easily be reversed. The third standpoint is that China's economy is in the interval of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udying these arguments versatily will help

收稿日期: 2011-02-28; 修订日期: 2010-05-20

基金项目: 2007年国家社科项目(07KSD015); 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度一般项目(YB2010016); 广西教育厅重点建设研究基地西南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资助课题。

作者简介: 刘俊杰(1965-), 甘肃会宁人, 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经济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us to understand “Lewis turning Point” better. Facing the increasing severe shortage of labors, we should use and cash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better and prepare for the population transition so that can realize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moothly.

Keywords: Lewis turning point; labor shortage; demographic divide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一、“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出及其背景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在“起飞”阶段的发展形态，表现为传统部门为现代部门提供“不变制度工资”和“无限供给”的充裕劳动力^[1]。但这种状况将随着经济发展出现“转折”。由于报酬递减规律，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农业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使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转移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使工业部门不断扩张。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以后，工资水平从不变制度工资开始上升，继续吸引农村劳动力，直至工业和农业部门具有相同的边际生产率，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收的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在扩展的刘易斯模型中，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两个转折点。第一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很低，劳动力对现代部门具有无限供给的弹性。随着现代部门扩张和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入现代部门，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升，减少农业劳动力供给诱发粮食产量下降，带来粮食价格和工资的上涨。通过对农业部门引入现代要素进行改造，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农业产出增长能够有效地满足现代部门的需要，部门之间的均衡发展把经济发展带入第三阶段，即经济一体化阶段。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换产生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劳动力由无限剩余转向有限剩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换产生了“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即有限劳动力被完全吸收殆尽。

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危机导致我国东部沿海外向型产业基地出现了严重的“民工荒”现象。国内人口领域的学者引入“刘易斯转折点”这一概念，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人口流动与城乡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而伴随“民工荒”等问题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我国进入劳动力流动的“刘易斯转折点”阶段，我国学术界在判断标准、实际效应及其政策含义等方面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学者们从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农业工资率以及人口转变对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不同视角的剖析。

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与否的不同判断

1. 我国已进入“刘易斯转折点”阶段

自2004年我国珠三角等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后，蔡昉等学者连续撰文指出，我国劳动力短缺并不是短期现象，而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前兆，或者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2]。从人口结构看，中国人口转变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替代水平2.1以下（目前为1.22），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预计在未来更长时期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从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看，蔡昉利用2005年的统计数据得出2004年实现转移和未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分别为2亿人和2.97亿人。由此可见，农村中尚有约3亿人未实现转移。按照目前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这些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中，农业生产需要1.8亿人，劳动力剩余似乎还有1亿多人。也就是说2004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是23.5%，还不到全部农村劳动力的1/4。假设务农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与留在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年龄结构相同，可以发现，真正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中50%是40岁及以上的经济活动人口，也就是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其量只有5800万人，剩余比

例只是 11.7%。而在中西部转移劳动力中,有许多流动到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务农,这部分劳动力被统计为农业劳动力。因此,目前的农业劳动力是在地区间做了优化配置的,并不存在严重的隐蔽失业现象。这可能进一步减少实际剩余的农村劳动力数量。所以,无论从人口结构还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上看,我国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

有学者认为,“刘易斯转折点”的两个重要标志是工资上涨和农村劳动力剩余的短缺,事实上这两个标志在我国劳动力市场均已不同程度出现。吴要武从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出发,推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应该发生的社会经济现象,通过对国家统计局和其他相关部门的数据以及企业和劳动者家庭或个人的调查数据进行检验,分析非技术工人工资变化、非正规就业规模变化,由此判断我国“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提前到来^[3]。

对于刘易斯拐点在中国的出现,与蔡昉等学者从人口结构和劳动力总量供给方面解释以及吴要武、黎煦等从农业工资增长率方面解释不同的是,任志成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可能与国际产业资本向中国加速转移有着密切的关系^[4]。由于发展中国家有着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会导致国际产业资本大量的涌进,对外直接投资大量涌进城市工业部门,进一步拉大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收入差距,必然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转移。国际产业资本促进了第一产业就业减少和第二产业就业增加,加速中国劳动力从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化。2007 年以来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路攀升,由此开始的通货膨胀与“民工荒”相继出现,也被认为不是巧合。刘学军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甚至超越了刘易斯转折点,持续的劳动力转移正在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5]。

“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相对应。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基本完成了人口转变,而尚未进入发达状态的国家人口转变仍在持续。中国是唯一的例外,虽然经济尚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但人口转变已基本完成。人口转变的提早完成,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线性回归分析表明,在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一个单位,经济增长速度提高 0.115 个百分点。但人口红利的一次性要求在人口红利期间进行必要的劳动储备,为大约 20 年之后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之时做好准备^[6]。“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红利”间有着某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后者消逝的前兆。

2. 我国尚未进入“刘易斯转折点”

对我国劳动力供给现状,大多数学者持相对乐观态度。他们认为,“民工荒”只是暂时的劳动力短缺现象,是户籍政策、工资增长和收入差距等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在我国出现。

(1) 对劳动力供给以及剩余总量的估计。孙自铎撰文就蔡昉对我国农村劳动力剩余总量的研究进行质疑,他的研究证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充裕,尚未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孙自铎指出,蔡昉判断的我国农村劳动力总数与实际总数不符^[7]。蔡昉所说的已转移出去的 2 亿劳动力,其中农民工 1 亿左右,事实上这部分人虽然进入非农产业,但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而是属于打工、农业两不误的兼业生产者。综合匡算,农业剩余劳动力至少在 1.5 亿~2 亿之间。对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计算,尽管学者们对剩余劳动的概念、计算方法、测算数据以及得出的结果并不完全统一,但大部分学者都接受 1.3 亿~2 亿这个数字。王诚认为,根据中国劳动部门的统计和预测,目前以及今后十几年,每年将在城镇寻找工作的劳动力是 2000 万~2400 万人,而 25 年来每年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只有 1400 万个^[8]。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在总体上每年存在着 30% 以上的失业缺口,我国劳动力市场仍旧处于供大于求的阶段。包小忠认为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有 2 亿人的情况下,出现“民工荒”现象在于企业没有及时提高工资,劳动力供求价格对供求反应不够明显^[9]。简新华、张建伟分析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发现,2004 年外出打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比增长 3.8%,和往年相比保持同比增长。同时,城镇等级失业率逐年攀升,就业形势并不乐观。由此认为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状在短期内都不会改变,短缺只是结构性、季节性和行业性的,用“民工紧”比“民工荒”更为恰当^[10]。钱文荣、谢长青也认为,我国农民工供给还有较大剩余,如果没有政府的合理制度引导,

“刘易斯转折点”不会自动到来^[11]。

(2) 基于工资增长的考察。有学者基于工资增长率变化视角考察我国是否接近“刘易斯转折点”。宋世方对我国农业制度工资的决定和变动方式进行了探讨,从农业部门的工资变化看,1993年以后出现实际收入较快增长阶段,而非农部门则在1997年后出现实际工资率快速上升。由此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在1997年后进入第一个转折点,但相关数据还不足以说明经济已经进入劳动力转移完成的第二转折点。农业工资的增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出现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的变化,但很难准确地判断出我国经济已到达“刘易斯第二转折点”^[12]。王德文认为农业工资的增长可能是因为通货膨胀导致整体价格水平的上升,或者因制度性因素提高了生存性工资水平等^[13]。日本学者南亮进举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城市产业工人工资高涨是因为经济景气的原因,并非日本经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来说明判断“刘易斯转折点”应根据边际生产力,而并非工资水平^[14]。周祝平认为“民工荒”和劳动工资上涨是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而并非劳动力供给出现长期短缺造成的。把经济高涨时期的工资上涨,看做是劳动力供给新阶段或者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实际上是对生育转变引起的个体劳动供给紧缩效应和经济景气效应的叠加效应所产生的一种误读^[15]。姜华东认为,“民工荒”是农民工在一定工资预期下的理性行为,农民工在劳动供给上不能表现出跨期替代的现象,虽然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在心理上受到工资的影响,但由于医疗、教育和生活等压力的影响,他们很难在实际中作出反应。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没有弹性,所以“民工荒”只是短期的劳动力供给短缺现象,不足以说明我国进入“刘易斯转折点”阶段^[16]。

(3) 基于基尼系数的判断。从基尼系数方面考察,日本学者南亮进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正在恶化,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382上升到2002年的0.445。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反映了劳动剩余的状况持续存在^[17]。从我国城镇化进程和就业比例考察,周祝平认为中国直到2007年,城市化水平仅达到45%,第一产业的就业比例为40.8%。从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看,第一产业的产值比例仅为11.3%,非农产业产值比例高达88.7%。就业比例和产值比例严重不对称,反映出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力还远没有达到第二个重要的“刘易斯转折点”^[18]。张宗坪指出,与日本、韩国这些已经出现过“刘易斯转折点”的国家相比较,日本、韩国在出现刘易斯拐点时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30%和34%,我国目前农业人口占60%~70%,远没有达到“刘易斯转折点”的水平。他同时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的“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与我国的农民工不同,刘易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部门的区分是基于生产要素、生产效率和收入分配规则来划分的,而我国的农民工是第一产业的劳动者,在农村拥有一定土地承包使用权,其部分劳动时间在城市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劳动^[19]。

(4) 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分析。在对“人口红利”的研究上,刘元春、孙立认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不等于劳动力短缺。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反映的只是人口结构转变的数量关系,与劳动力短缺没有必然关系。产业结构的优化、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和技术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等必然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多在质量方面而不是数量方面。仅从劳动力数量的角度,就断言劳动力短缺未免有些偏颇^[20]。沈君丽研究表明,农村比城镇有着更为年轻的人口结构,农村正处于农村人口视窗开启期,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快,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限制使得农村人口红利难以实现。而制度障碍限制劳动力由经济落后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由低效率部门转向高效率部门是人口红利不能顺利兑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21]。

3. 我国处于“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内

如果说“刘易斯转折点”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也可以说我国经济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内。王德文指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即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尚未到达“刘易斯第二转折点”^[22]。李永杰、杨本建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是总量剩余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这种“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形成,在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之后与人口

类型的转变^[23]。劳动力流动推迟了经济发达地区人口转变，从而延长了这些地区人口红利期；同时加速了经济不发达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人口转变，缩短了这些地区的人口红利期。从而使得我国一些地方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而另一些地区尚未达到。李月在研究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台湾经济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后的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工资的变化后，基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发展差别大的特点，将市场分割为东部和中西部进行考察。根据东部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以及工资上涨现象与台湾地区20世纪60年代情况相似，认为东部地区正在向“刘易斯转折点”趋近。而中西部地区虽然也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与工资上扬等现象，但数额仍然很低，并且中西部地区还存在大量农村赋闲劳动力等待转移，由此可见中西部等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离刘易斯拐点尚远^[24]。

三、述评及对“民工荒”现象的进一步思考

1. 研究评述

对文献的整理与归纳可以看出，学术界就我国是否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尚存在较大争议。大部分观点认为，目前的用工荒只是暂时现象，我国还存在富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近年来农业工资的增长也是应对“民工荒”现象而出现的。尽管如此，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城镇化速度的加快，也时刻警示着我们“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基于对经济增长与劳动力流动现状的综合判断，我们认为我国已经跨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劳动力供给已经由无限变为有限，但尚有一定储备，还未到达劳动力被吸收殆尽的“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同时还应看到，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很低，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是不争的事实，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老龄化现象将日益显现，人口负担也会进一步加重，由此必然导致我国长期拥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资源禀赋渐次消失，由此带来的判断是中国趋近“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的速度正在加快到来。之后，剩余劳动力的消失将推进实际工资上涨，并提升工资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我们应该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完全吸收殆尽，“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到来前，进行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型，顺利渡过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过渡期，利用和兑现人口红利带来的机会，这种转型无论对中国还是全球经济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2. 对“民工荒”现象的进一步思考

如果说“刘易斯转折点”是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必经阶段，那么先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前的“民工荒”现象也不是自然发生的，在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种种制度弊端的作用下，“民工荒”现象得以发生并且持续。

(1) 城市内部存在的“新二元结构”使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在工资（初次分配）上无法与城市居民相比，在社会福利（再分配）上更无法达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低的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加大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机会成本。

(2) 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雇用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行业只需要农民工提供体力劳动即可，缺乏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这种缺乏技术基础的生产模式决定了企业的工资平均水平和上涨空间，即使企业给农民工加工资，上涨的幅度也不会很大。同时由于工作性质不需要技术水平，企业也不会对农民工进行相应的技术培训，会造成技术密集型企业缺工缺口越来越大。

(3) 近几年中央着手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如减免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实行种粮直补，购买农机具补贴和良种补贴政策等。一系列的惠农政策提高了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加大了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

尽管“民工荒”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但同时也暴露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和制度弊端，揭示了我国已经渐渐失去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资源禀赋，为我国经济发展顺利由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向第二转折点过渡敲响了警钟。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对我国经济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只有加大结构转型力度，转变依

靠劳动数量和资源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目的。

首先，在促进简单制造业向科技型和创新型升级的同时，推动加工制造企业向中西部转移，在中西部地区形成完整的从上游零件到下游组装的产业链。富士康等国际代工企业的大规模产业转移已经预示了这种趋势。

其次，深化教育和加大农民工培训力度。建立农民工培训机制，一方面可以缓解技工岗位缺口，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再次，完善缩小劳动收入差距的制度保障机制。农业工资大幅度上升是“刘易斯转折点”的重要标志之一。“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促使企业为吸引更多劳动力而提高工资，但在城乡二元制度背景下，城乡劳动者在非工资性社会保障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工资的上涨并没有淡化真实的收入差距。从制度层面建立公平、公正的劳动收入分配机制，优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利益关系。将工资收益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同步协调推进，使农民工获得与城市职工相同的待遇，改善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改善劳资关系。

最后，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农村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场所少且布局不合理、制度不健全、信息不畅通等问题，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和城乡互动的劳动力市场，是为企业提供优质劳动力的保证。要整合资源，充分利用各种教育系统与媒介、各类职校和培训机构，定期开展培训，在消除歧视性制度安排的同时，向城市及其非农产业输送各种实用型人才。

参考文献：

- [1] William Arthur 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J].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2).
- [2] 蔡昉.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 8: 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 (2007)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95 - 111; 147 - 161.
- [3] 吴要武. “刘易斯转折点”来临: 我国劳动力市场调整的机遇 [J]. 开放导报, 2007, (3).
- [4] 任志成. 国际产业资本流入与中国“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关系分析 [J]. 国际贸易问题, 2008, (9).
- [5] 刘学军. 通胀困境与刘易斯转折点: 是偶然还是必然 [J]. 探索与争鸣, 2008, (11).
- [6] 陈友华. 人口红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J]. 江苏行政学院院报, 2008, (4).
- [7] 孙自铎. 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了吗? ——兼论经济增长人口红利说 [J]. 经济学家, 2008, (1).
- [8] 王诚. 劳动力供求“拐点”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5, (6).
- [9] 包小忠. 刘易斯模型与“民工荒” [J]. 经济学家, 2005, (4).
- [10] 简新华, 张建伟. 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制度分析 [J]. 人口研究, 2005, (2).
- [11] 钱文荣, 谢长青. 从农民工供求关系看“刘易斯拐点” [J]. 人口研究, 2009, (2).
- [12] 宋世方. 刘易斯转折点: 理论与检验 [J]. 经济学家, 2009, (2).
- [13] 王德文.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 标志与含义 [J]. 人口研究, 2009, (2).
- [14] 南亮进. 经济发展的转折点: 日本经验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15] 周祝平. 经济发展阶段、生育转变与劳动力供给 [J]. 人口研究, 2009, (2).
- [16] 姜华东. “民工荒”并不能说明我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 [J]. 开放导报, 2007, (3).
- [17] 同 [14].
- [18] 同 [15].
- [19] 张宗坪. “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已经出现”伪证——“民工荒”假象分析 [J]. 山东经济, 2008, (2).
- [20] 刘元春, 孙立. “人口红利说”: 四大误区 [J]. 人口研究, 2009, (1).
- [21] 沈君丽.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 [J]. 南方人口, 2005, (1).
- [22] 同 [13].
- [23] 李永杰, 杨本建. 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点与城乡劳动力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8, (2).
- [24] 李月. 刘易斯转折点的跨越与挑战——对台湾 20 世纪 60、70 年代经济政策的分析及借鉴 [J]. 财经问题研究, 2008, (9).

[责任编辑 董洪敏]